

## “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昨日公映

## 让观众深情凝视 让历史永远铭记

昨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一部反映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电影《二十二》登陆国内院线，引发了众人关注。名导冯小刚接到演员张歆艺的“求助信”后，力推该片，但同时，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这部电影是对老人们的打扰，是“消费伤痛”，该片主创也出来介绍了该片的来龙去脉，并表示除了“让世人勿因幸存者相继离世而忘记这段历史”的目的之外，这部纪录片还想让“慰安妇”不再符号化，展示老人们当下的生活状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实习生 张宝藩



“慰安妇”韦绍兰老人，2015年旧照。

## “慰安妇”不仅仅是历史符号

2012年，导演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篇名为《世界上唯一公开身份慰安妇：儿子至今未婚》的报道，讲述了90岁的“慰安妇”韦绍兰的故事。因被这段历史吸引，他投入数年，用电影形式将韦绍兰老人的生活状态完整记录下来拍摄了《三十二》，但在2014年他决定将所有幸存者的故事都搬上银幕时，由于一些老人的离世，片名已经由《三十二》变为了《二十二》。而在今年8月14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上映时，在世者不过8人。

“当年纪录片拍了以后，韦绍兰老人完全颠覆了我对‘慰安妇’的看法，我觉得她们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甚至这么老的一个老人能鼓励我这年轻人去面对将来的生活。所以在后来我一直不停地去关注韦绍兰老人，跟她相处，拍了第一部短片。做短片后期的时候，那部片子叫《三十二》，2012年还有32位幸存者，到2014年年初的时候只有22位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拍一个长片，因为老人们将来可能都不在了。”郭柯导演告诉记者。

“开始拍摄时候，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团队该以什么身份去面对她们，包括怎么去提问，怎么跟她们相处。真把她们符号化吗？为挖掘历史，费尽心思套她们话吗？没必要。最难的是放下这些东西，去肯定老人，去做一些看似非常无聊的东西。我们每天陪着她聊天，看着她扫地，去拍一些她的日常。对拍戏的来说，这些完全不可想象——这是在干嘛呢？但是，我们就放下来了。”郭柯坦言，摄制组心中都觉得这是一次比较特殊的记忆，觉得这片子属于“有意义的东西”。

## 拍摄时困难重重

拍这样一部电影，困难重重。2014年1至7月，全剧组23位工作人员在经历了11996公里的跋涉、5733公里的飞行、32海里的轮渡、16所宾馆的下榻、11种语言、9位当地

人的翻译后，在29个拍摄地（5省、13个市县），对22位老人进行了拍摄。

拍摄之途艰辛劳顿，片子面世历程也是一波三折。拍摄初始，投资人撤资，郭柯只能向曾经合作过的演员张歆艺求助100万，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但由于缺乏发行资金，电影只能在电影节和部分院线点映。“想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剪辑、最好的海报来呈现这部影片”，郭柯并不希望《二十二》只换来“影院半日游”的命运。他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些老人的生存状态，虽然从题材看，“半日游”仿佛是这部纪录片与生俱来的宿命。

但事情并未让他绝望。完成制作后，宣发费用紧缺，靠29135位朋友众筹，获得100万元；而在众筹之后，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而张歆艺也给冯小刚导演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领头发声，帮这部片让更多人看到。冯小刚迅速微博支持，随后众多明星纷纷转发，让《二十二》直接重上了微博热搜。

在推动电影在商业院线上映时，他们说：“希望等电影上映之时能有1%的排片，目标是超过20万人次观影。因为在抗战期间，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女性数量在20万人以上。而电影后产品销售收益及票房收益，都将全部捐献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慰安妇’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

令人欣喜的是，昨天是该片首映日，而排片一天之中也从1%稳步上升到了1.5%，产出了380万的票房，上座率高达31%，是当日所有上映的影片中的最高。

## 从不是贩卖伤痛

然而，和当初的短片高分好评不同，再拍长片，郭柯和他的团队在网络上受到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贩卖伤痛，在拍摄过程中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对这些质疑，郭柯都进行了平静的应对，而其他很多专家，也并不认同这样的质疑。

“如果把摄影机搬到老人的家门

口或者搬到身边是一种伤害的话，那肯定是有，但是我们尽量把这种伤害减少到最少，我们拍了她们，我们会对她们将来的生活也会有一些关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也有成长，大家现在在影片中看到的呈现方式，很平静，这是我们的选择，有些老人我们远远看她们一眼，机器摆在门口，不进屋，配上字幕，这位老人姓名谁，住在哪，她的家人是谁，镜头放15秒到20秒，大家深情地看她一眼，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导演说。而据了解，每年逢年过节，导演还会带着团队去老人的家乡看望他们。

而出资人张歆艺则说：“如果五年前郭柯没有来做这件事情，今天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为这类人群发声了。说得再简单再有人情味一点，我们每个人听到这群人，都想知道她们过得好不好，她们现在还好吗，她们怎么样了。但问的人很多，真正去做、去关心、去看她们的人其实很少，不是说他们不想去看，也许因为生活中的种种原因，他们可能没有迈出这一步来。但我觉得郭柯就算不是一个电影导演，替大家看一眼，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善良的举动。‘贩卖’这个词太严重了，好像不太适合郭柯导演做的这件事情和这个话题。”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陈俊峰也气愤地表示：“如果说有网友认为这种是消费幸存者的感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大屠杀纪念馆那就是消费历史，消费幸存者感情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完全错误的，历史是需要传承和传播的，大家知道在韩国有一个星期三集会，每个星期三韩国一些老年人、青年人甚至学生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面集会，以表示对日本这种否认历史的行为抗议。我觉得很有价值，通过它的发行和上映，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历史，我们经常讲铭记历史，如果历史忘记了，怎么面对现在、面对将来呢？”

做了30多年慰安妇调查的民间志愿者张双兵则期待，外界不要用现在金钱这种观念来认识这件事。

## 文化动态

## 中国作家冲雨果奖 希望在于中短篇

“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永远，雨果奖不会再跟我有关系了，”在冲击2017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失败后，刘慈欣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这样对记者说。

刘慈欣说，他还将继续写作，写长篇小说，但需要很长时间。“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就很不简单了。要想在短时间内写出优秀作品，甚至获得国际大奖，真的很困难。”

两年前，刘慈欣凭借长篇小说《三体》第一部英文版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世界科幻界最高荣誉的亚洲人。这一次，《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英译本再度入围，却未能最终胜出。

刘慈欣认为，由于国内科幻界还缺少能够创作出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作家，因此未来中国人冲击雨果奖最大的希望在于中短篇。“国内有很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优秀的短篇作品，如果很好地推介，可能还有机会获奖。”

刘慈欣说，人们所说的世界科幻作品，实际上是美国科幻作品。美国科幻作品和作家数量及阅读群体规模可能占全球80%以上。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水平都差不多，中国也是如此，可以说还处于科幻作品发展的初级阶段。“美国科幻作家协会注册的作家有3000多人，活跃的科幻作家有近2000人，而中国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家大概也就二三十人，这个短板不是短期内能够突破的。”

刘慈欣认为，《三体》两次获雨果奖提名、一次胜出，这一成绩的取得，为中国科幻作品走向世界开了个好头。不过，中国科幻要得到世界认可，首先还是要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

截至目前，《三体》英文版在国外销量超过30万册。“要知道，一般的中文小说翻译成英文后销量也就是三五千册。”8月11日，在第75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现场举行的签售会上，《三体》英文版销售一空。

其中，各国读者排队找刘慈欣签名的场景让他印象深刻。“问题是我只有一个小时的签售时间，到时间就要让给下一个作家了。因此，组织方不得不劝说排在队尾的50多名读者离开，”刘慈欣遗憾地说。

为纪念20世纪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雨果·根斯巴克，世界科幻协会从1953年开始颁发雨果奖，它与星云奖一道被公认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两项世界性科幻小说大奖。

世界科幻协会11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75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上宣布，美国科幻作家杰米辛获得2017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刘慈欣虽然入围但未能获奖。

据新华社电